

湖湘

莫志斌 主编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 史学家卷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库

莫志斌 主编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

史学家卷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库
乙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史学家卷 / 莫志斌主编. —长

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648 - 0323 - 0

I. ①湘… II. ①莫… III. ①史学家—列传—湖南省—近代②史学家—列传—湖南省—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407 号



湖湘文库 (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史学家卷

主 编 莫志斌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欧继花 黄 晴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press.hunnu.edu.cn>

地 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 编 410081

营销部电话 (0731) 88873071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 × 640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352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8 - 0323 - 0

定 价 9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青园路 4 号 邮编: 410004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史学家卷

主 编 莫志斌

编 撰 莫志斌 李长林 张灿辉 徐良利
朱发建 梁爱君 田燕兵 彭林强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在鸦片战争后整个社会的急剧动荡中，西学的不断传入，极大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作为传统学术最重要支柱的史学也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转折。而在此史学鼎革与守旧的历史变迁中，“敢为人先”的一代又一代湘籍史学家在民族民主革命与构建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洪流中，用自己对史学研究的执著与追求，谱写了光彩夺目的史学华章，成为湖湘文化资源宝库中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

纵观中国近现代一百余载的史学思潮之发展历程，表现为传统史学的衰落、历史考证学的丰厚创获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势发展，三大史学思潮间相互撞击，此消彼长，推动着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湖湘史学亦在此三大史学思潮影响之下名家辈出，硕果累累。

一、湖湘传统史学的流变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方面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成为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这就促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儒家化倾向，并使之成为儒家史学；经史不分、互为表里；“六经皆史”，诸史皆“经”，使经学史学化，史学经学化。湖南因社会

发展所具有的独特性，传统史学的形成颇晚，溯源宜是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在书院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对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大，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经世致用、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王夫之以古今上下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经世致用，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巨大。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自船山之后的湖湘学人，比如魏源、曾国藩等人，在治学方面，大都受船山学的影响。

进至清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称为“汉学”。又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的校勘、编目、辑佚、辨伪等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就。这些成绩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与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方便，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但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

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社会问题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用的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之正讹，一名一词之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随着大清王朝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许多开明的知识分子便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然而，作为一种治学传统却并未因此消失。清末民国间，湖湘学人在经学与考辨史学方面也成绩斐然，诸如皮锡瑞、王先谦、王闿运、叶德辉等人就是湖湘学人中的佼佼者。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不仅传统经学衰变，中国传统史学也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动向。西方力量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自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经世致用思潮勃兴。经世致用之学的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颀、颜元、王源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这种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

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清嘉庆、道光间，在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文化随着时代的跳动而前进，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进程中起着发端与启迪作用。

魏源，字默深，原名远达，字良图。湖南邵阳人。他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光。”面对当时学风，魏源愤恨“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他认为学问必须“施于政事”，提倡治、道、学三位一体，强调史学研究要学以致用。魏源认为有用的史书应该是医治社会的药物，历史研究必须“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工程实事”，重视和联系社会实际来治学办事。在其倡导下，形成了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魏源等以匡济天下、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大声疾呼：“衣垢必浣，身垢必浴”，提出了改革社会弊端、改革用人制度等许多主张，并在林则徐赠送其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划时代的世界百科全书《海国图志》，让国人正确认识世界，改变闭关锁国、唯我天朝独尊的思想，开阔视野，激发富国强兵的热情。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面对西方寻找出路。然而，他的济世泽民、拯救国家危亡的思想，未被当时统治者所采纳。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他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用经世思想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向西方学习。

二、湖湘近代历史考证学的丰厚创获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直接运用史学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极端强调史学研究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学术性与求真未有足够的认识与应有的重视。结果造成当时的学术成果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倾向。五四运动前后，随着近代科学思潮和西方学术观点、自由思想的影响，中国学术领域中掀起了一股以“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新学术文化思潮。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观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反对实用主义地看待学术的功利性，要求学术不能以一时的政治为目的，史家不能局限于现实政治的经世致用，而要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坚持“求真”原则，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他们利用西方“实证主义”原理为中国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这种中西学术方法论的会通，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如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古史”说，一并成为

中国现代学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在这股学术思想的影响之下，一向十分强调以学术经世的戊戌变法干将梁启超也提出了“求真”与“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然而，以“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近代考证史学希冀摆脱现实政治的羁绊，追求学术的自由独立发展，但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史学还是史家均不可能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难深重，民族危亡，许多考证求真史家开始转向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将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政治相结合，注重史学实践。此际之湖湘史家李剑农、周谷城、向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三、湖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诞生，在中国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对历史的求真和对现实革命和政治的指南为主要使命，是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又一非常重要且具特色的学术产物。湖湘史家在近百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记和影响。在1919—1949年这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中，1919—1927年为第一个阶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奠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代表作有湘籍革命家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刘少奇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等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很微薄，但他们都注意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等基本原理，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是按照“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

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及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学说和理论。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要代替共和政治，如同共和政治替代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不可逃脱的命运。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37 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陷于空前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1929 年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1931 年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民族危难又一次迫临古老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最富革命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越发显示出其真理的力量和光彩。因此，革命低潮的形势也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和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概念，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历史。由此在当时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有三大问题：一是战国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与世隔绝社会？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论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1931 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史论战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社会性质论战，已出现一些不同观点的有关社会史的文章和著作，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1931—1933 年为第二阶段，各派纷纷登场，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的争辩，是社会史论战最为激烈的时期；1933 年《读书杂志》停刊以后为第三阶段，剑拔弩张的争论已告一段落，人们转而从事资料收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同

时继续有关问题的讨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标志着社会史论战的结束。这场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深入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向世人有力地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将走向何处。由此，处于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同时，开始形成其专业工作者的学术队伍，吕振羽、翦伯赞与郭沫若等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面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五四以来以追求“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中国文化思潮迅速转型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也以史学为战斗武器，迅速融入抗战文化运动中去，为鼓舞中国广大军民的士气，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阶段。在“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历程，逐步改变过去轻视中国历史的种种认识，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相结合，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断代史、通史、民族史、社会史、人物史等诸多史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方式进一步丰富，传播渠道也得以拓宽，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也日趋扩大。1937年“七七事变”后，吕振羽回到湖南长沙，同翦伯赞等人筹组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创办了《中苏文化》月刊。1939年吕振羽接受周恩来电召，到重庆任复旦大学教授，一面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面进行统战工作。为了批驳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错误观点，痛斥民族投降主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重庆一年多时间

内，吕振羽连续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止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1942年辑成《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并于1941年由生活书店出版了上册。翦伯赞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简明中国通史》下册完成并出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重要著作。

翦伯赞于1938年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系统地宣传与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序中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撰写的目的是“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批判“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从上可以看出，翦伯赞的史学方法一开始就不搞教条主义，而是从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把抗战救亡、为现实斗争服务看作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走史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翦伯赞一方面扬弃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深刻地抨击近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史学，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且在实际上，是可以当作现在正被抑压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应该“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污秽的手中夺了

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则”。史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抑压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把历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抗日战争中后期，翦伯赞一方面研究抗日民族战争的现实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积极从事中国历史科学的拓荒工作。他写了38篇有关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分别收集在其两部《中国史论集》中，同时撰写了两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取得了历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正是由于以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大师的辛勤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此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并由此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上，湖湘史家吕振羽首次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史前社会，翦伯赞则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建设，他们均为构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殿堂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从上可知，清末民国间，湖湘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附庸于各种史学思想的史家层出不穷，其史学造诣与史学成就冠冕当时，惠及后代。进入21世纪，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为了弘扬湖湘文化传统，投巨资打造《湖湘文库》这一世纪宏伟文化工程。位列《湖湘文库》的本书主要是梳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宝库中的史学成就，文库中已列专书研究的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等，不在本书论说之列。即使如此，仍难免挂一漏万，且收录之各史家事功编著亦有薄厚之嫌，敬请方家海涵指正！

张灿辉

2010年10月